

## 國史瑣談（八）

王爾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員

先說我是一個無名無位的普通人，只是專業治史，可以看作是史家，教導過大學，而成為教授，同行累萬計，並不特殊，只是有不少著作問世，自信對後人有益而無害，自當心安理得。既是教書先生，門下子弟可能有大聖大賢以至於治國偉人。古代勸人立志，要「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雖然浩氣干雲，教書那敢出口？不敢流於誇大之譏。

鄙人教學治史全重在近代，口宣筆談終以世界變局為重心。同道名家，觀念一致，我亦著作專文討論。我輩群趨於這樣主流，却完全忽略在變局連連世代，使原來固有知識學問多被遺棄喪失，不能再提起「為往聖繼絕學」，只能惋惜絕學大量消逝。百年來並無一人提到今世之「絕學」問題，既做史家，似當留意思考。鄙人冒昧大膽，要在本文略舉一些今代之「絕學」。

古今歷史，世變代嬗，為本質所備，必有絕學亦屬當然，並不為異。惟近代百餘年，變局最烈，新奇層出，舊事當隨之淘汰，大小「絕學」不斷湧現，史不注記，終必消逝殆盡，後難追考。茲舉數例，以見史料保存不易。

### 其一，關書

「關書」流行於明清時代，而消亡於抗日戰爭勝利之後，1950年之後即成絕學。

關書盛行於清代之地方官之徵辟幕府賓僚，亦即衙門中非官職身分之助理人員，因

為並非屬吏，而定名為幕府。上自封疆大吏下至府州縣牧令，主其政者以其個人銀錢聘請幕賓相助理事，其下聘用正式帖東邀請幕友來助。但是，官家之外，民間各地城鄉村鎮稍具貲財者，為子弟聘請塾師教讀五經四書以至學八股文、試帖詩等科名知識，亦須「下關書」呈交塾師，並亦形成一定形式規格，為民間最常行常見之一類。

今謂「關書」已是絕學，自是逐漸消失於抗日八年戰爭之後，到1949年以後應成絕學。在此六、七十年間能出而著書論及「關書」者只有繆全吉教授一人，因著有《清代幕府人事制度》一書，書中提到徵辟幕賓，須致奉關書。繆博士雖是政治學家出身，而此書當是史學上傳世之作。

繆全吉將幕府功能區分甚細，而重要者一般看重「刑名」、「錢穀」二種，姑不加詳，尚有他類。因不屬於官職，其名稱略命為文案老夫子，若是只作鈔錄、記帳、掛號、行走者，則絕不會下給關書。如清咸豐間曾國藩湘軍幕府只提許振禕、吳子序、李鴻章，而幕中自有下級鈔錄、記帳者，亦是文案師爺，自不會下給關書，酬付束脩不過二、三十兩銀而已。大抵關書多是不注明束脩若干，雖湘軍並不富有，而李鴻章等不會少於白銀百兩。繆全吉之書，涉及束脩未有正確結論，多謂千金或數百金，不敢引據其說，備作參考可也。

關書之一種帖式，起用於清代地方官之徵辟幕府，行之二百餘年。自中華民國時

期，自隨政治體制改變而失其存在價值，但在鄉里村鎮之廣大地域，却由普通民家繼續保持關書這種帖式。主要是稍具資產之平民知書戶，為教育子弟而置家館學塾供為讀書之所，進而約請蒙學老師，向之所謂三家村夫子，由其教訓子弟。雖在清亡之後，村里學塾實俱存在，各省地方累萬千計，一直存在。鄙人在抗日戰爭前後，早讀家塾學館五年半時光，自是親身經歷。

關書即備用於民間之家館學塾，聘請塾師來教，先需致送關書，帖式與幕府相同。

對日抗戰之後，公立小學各地遍設，家館不復存在，關書自亦歸於無用。此既已淪為絕學，而其關書帖式則被收載於昔日廣用之兒童教本中，當可直接引據。在固有兒童教材之中，有《幼學故事瓊林》一種小書，乃是雜輯各樣民間應世往來知識。在舊有之社會應酬知識，俱廣收並蓄，足備參考。關書帖式亦收載其中，今當直引其帖式及說明於次：

「關書」要用大紅紙封套，上寫「某姓、某字（不書名）、老夫子惠存」。清代幕府亦全同此式。

「關書」帖式亦用紅色，並是複柬，以六摺為度。首頁摺面題「關書」二字，自第二摺面起書寫正文。茲抄錄原文：「敦請

某號某姓老夫子〔抬頭書寫〕，某年訓迪一載，學徒幾人，歲奉脩金幾十兩，節敬幾兩，按節分送。此訂。

教弟某名頓首拜。〔另行寫定〕」

上舉帖式字樣，大抵為清代版本所遺存。同時在接着又加註明解釋，茲亦照抄如下：

凡寫關書，須寫明脩金若干兩。如係按月送者，則寫每月支送脩金幾兩。必到館之日起脩。有月費者，寫每月月費若干。

中國地大人眾，各地平民家館何止數百萬計，而關書之用普遍，直到抗日戰爭之後，終至消寂無存。

## 其二，魯班尺

此一短文志在介紹魯班尺，但是魯班尺原於《魯班經》，勢須就《魯班經》略作引述。

鄙人學淺，不能就古史上公輸般解說《魯班經》來歷，却相信公輸般並未著有《魯班經》之書。至於生平所見之《魯班經》，乃是一種明代傳刻本，實不敢再向明代以前談說是否已有《魯班經》傳世。

我在 1970-80 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無意見到《魯班經》薄薄兩卷本，雖是雕板，而刻工粗糙，但却是專門工藝之學，相信有參考價值。此書現藏香港圖書館，乃當地海邊小村幼學塾師翁仕朝所收存，有兩個重點，應當在此說明。

第一，此書是明代之傳刻本。此書正式書名是《新刻京版工師雕鏤正式魯班經匠家

鏡》，此是本書正名，可惜封面封裡俱不存在，如不小心，不會看得起這種小書。

第二，極重要，此書之編著者是三位工匠，各有頭銜，正是明代宮殿建築御用工師。茲開列如次：

北京提督工部御匠司司正午榮彙編、局匠所把總章嚴同集、南京御匠司司丞周言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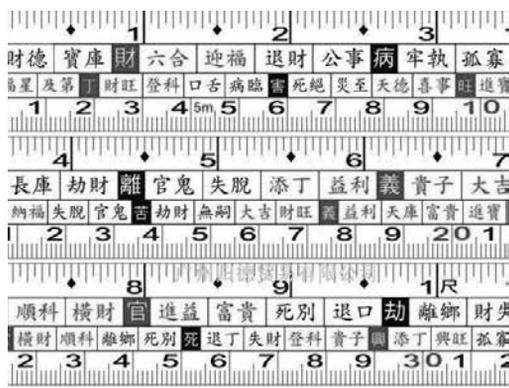
我等史家熟知，凡北京、南京並列，只有明代有此體制，清代絕無。我肯定負責擔當此說。另在圖書特出之風格言，凡言「京板」必是明代刻本。我亦擔責。

此書最前附有一篇「魯班仙師源流」，有似序。全文荒誕鄙俚毫無可取，惟其文中正式提到明永樂帝建北京宮殿，有謂「我皇明永樂間，鼎創北京龍聖殿，役使萬匠」之說應可相信。本文僅要介紹魯班尺，自不能再申述其他重點。

讀到這一本《魯班經》，可從書中見到「魯班尺」的說詞，可推斷魯班尺決非原始於古代公輸般，就其書出版於明代，亦當能斷定魯班尺是建築工人逐漸演造這種特殊尺度，積久相沿傳習，一般人甚至飽學之士亦多不知曉，真是一種專門法式。

建築工師正常使用民間共同之市尺；工人為之大型曲尺，便於度量大小長短。市尺即曲尺，一丈含有十尺，一尺含有十寸。未料何時被風水師用於輪值八方與中央之位

向，分為：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所值中央及八方每年不同，風水師於此九位值向，定出宜或忌之區別，大抵一白、四綠、六白、八白、九紫是吉向，宜採其向。而二黑、三碧、五黃、七赤等值向，則須忌。建築工人亦重值向宜、忌而引用於建造房屋。（自是一種迷信）



說到魯班尺，出於工師專門，亦有特殊法式，非常人所知。當引據《魯班經》原文以見其說：

按魯班尺乃有曲尺一尺四寸四分。其尺間有八寸。一寸推曲尺一寸八分。內有：財、病、離、義、官、劫、害、本也。

對於此段引文，須稍作解析。一則魯班尺原來只有八尺為全度；二則每尺亦只含八寸；三則與曲尺（即市尺）相比，一尺等於市尺

一尺四寸四分。如此看來，建築工師為房東建屋，必須慎加安排房門、上堂、倉廩等等，要與財、本、官、義尺度配合，亦須慎擇市尺之有利位向。

看來魯班尺未被清朝官方重視，故其工部功令之《營造法式》一書，未嘗引用魯班尺。

中華民國創始之後，一切建築工程全蹈西洋學識技藝，使用測度尺寸，一仿英尺、公尺，自亦不再使用魯班尺舊習，其法其學，終亦盡歸消亡。

### 其三，蘇州碼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雖遠不及埃及與巴比倫兩大文化體年代古老，但仍能代表一種獨特之文化體，是中華民族創造之文化遺產，值得後世子孫自立自信與自尊。國人普遍熟知，不待申述也。

本文不便高談濶論，在此只是涉論平民日常生活中所應用之一種計數記帳之數字符號，雖然不登大雅之堂，而民間習用當有數百年之久，是謂之「蘇州碼」。

中國古人計算之學有文字以前自難追考，而有文字以後當三代以至秦漢帝國時代早有精密算法，閱讀紀元前二世紀漢代之《淮南子》，其計算天文之五星運行，均用分數表達，至為細密。日月周天行度亦用分數表達，但其運算之法，已無法追考，殊感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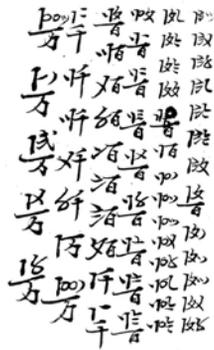
今談庶民生活中計算記帳之蘇州碼，世

人尚有知者。參閱今人顧盤甫撰〈奇特的記數符號〉大文（據《世界日報》2014年11月5日《上下古今》專欄）所講即指明蘇州碼，謂有五百年歷史，長期廣為存傳使用。鄙人亦是久已熟知蘇州碼之人，故敢草此短文，為後世保留片段紀錄。

拙見以為世傳之蘇州碼，其產生淵源應來自古代籌算。我曾撰文引《史記》所載在楚漢相爭期間，劉邦的謀士張良為他獻計，有一段「借箸代籌」故事。學人俱能用此典故，我亦曾撰文介紹，收載拙著《構乘小品》（27-29頁），故不在此重叙。正當漢王用飯之際，張良入座，就使用兩人的四根筷子，擺出八條有失損的錯誤。籌式八條是：一、=、三、三、×、上、六、三，代表自一至八之數，後來之蘇州碼，民間習用於記帳，俱多如此簡易。而今停用已數十年，舊帳簿多不保存，早當廢紙丟棄，鄙人昔在香港任教却見當地一位三家村老儒師翁仕朝一直存藏家中歷年田地收租有十多本厚帳簿，全用蘇州碼記帳。



蘇州碼



蘇州碼

最難一見者，是老儒翁仕朝寫下兩頁蘇州碼純教材傳示後學，全中國只此兩頁，極為珍貴。今雖已是絕學，更有保存備考價值。主要關鍵，香港圖書館雖自上世紀80年代收藏翁仕朝生平文獻，但未必看重已停用之蘇州碼，而此薄薄兩頁，恐已早被丟棄。但願學界諒我多事，小題大做。

### 餘論

中國歷史悠久，文化造作輝煌。先民務實，重人本而厚民生。集眾力於人事經營，滙積為種種學問。加上發明文字，乃能代代傳承。亦自不免因改進而時有起滅，遂見有消逝之絕學，此文化變遷所不能免也。

中國歷史悠久，亦早創生文字，然自上古以降，文物制度，思想學說亦有生有滅。如甲骨文、鐘鼎文之文字語法亦早為篆書代替。後世則長期代以楷書。惟今世學者仍能研究上古之甲骨文、鐘鼎文。

以思想學說而言，在前古亦有絕學發生，如墨子在戰國時期與儒家齊名，並稱儒墨顯學。然在漢代以後，亦竟消亡於世，但今世學者研究《墨子》一書，仍有名家之作。吳毓江即是一代墨子學大師。

最晚可看抗日戰爭以後，最低可見明清以降至抗戰前，北省各地民家每每有尼姑道姑宣講《寶卷》，到大戶人家宣講俱能收受紅封禮金。鄙人幼年在家中亦遇上一次尼姑宣講寶卷。不過奉賞甚薄，只招待其吃飯，

另給若干錢銅錢而已。抗戰期間即已成為絕學。

中國歷史悠久，文化深厚，加上文物圖書豐富，華洋學者仍有高人注意研究。可信文化不會滅絕，但由世變紛乘，西化日深。國人普遍疏於固有文化，如此發生絕學為大勢所趨，無法繼續保存。在此小文略加談談，所見不廣，尚祈識者諒我固陋。

2015年1月18日